

● 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

魏志江 等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

魏志江 等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魏志江等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1

(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

ISBN 978 - 7 - 306 - 03544 - 8

I. 冷… II. 魏…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韩国—现代 IV. D829.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2324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李海东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曹巩华 曾 斌

责任校对: 李海东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n.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14.75 印张 3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总序

梁庆寅

这套“中山大学韩国学丛书”是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套丛书。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于2006年6月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开展韩国研究和中韩关系研究，促进中国和合作与交流，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手创立的。上个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曾与韩国有过一段值得记忆的联系。1921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务部长申圭植访问广州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这次访问实现了孙中山护法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而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中山大学接受韩国流亡青年入学，为韩国培养了200余名从事独立运动的骨干。随着中韩两国建交，广东省与韩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广东省与韩国京畿道结为姊妹省，每年互派公务员研修，广东省在中韩两国的经贸领域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两地的文化与民间往来日益密切。

中山大学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一直致力于发展与韩国的友谊，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的成立，翻开了中山大学推动与韩国合作交流新的一页。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主要研究华南地区韩人和韩人社会、广东与韩国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中韩两国外交和经贸合作、中韩两国在共同应对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以中韩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中韩日三国关系与东亚区域的研究。

我希望，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中山大学与韩国高等院校、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能够进一步增强，共同促进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

2008年8月于广州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韩两国由于国际“冷战”格局的制约，长期处于关系不正常的状态。“冷战”结束后，随着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终于结束了中韩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此中韩关系进入了迅速和稳定发展的新阶段。1992年10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正式揭开了中韩两国首脑互访的序幕，标志着相互隔绝和互不承认达50年之久的中韩两国外交关系开始走上正轨。随着“冷战”后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从中韩建交到韩国总统卢武铉任期，中韩关系大体经历了睦邻友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和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三个阶段。2008年5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中韩两国关系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冷战”后的中韩关系已经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冷战”后，中韩两国能够建立外交关系，既是中韩关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变动密切相关。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从而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中韩两国经贸交流关系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也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而韩国也上升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政治外交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不仅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中韩两国还建立了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机制，从而改变了以往中韩关系的发展重经济而忽视政治和外交、安全领域的格局。中韩两国实现了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尤其是在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与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方面，中韩两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合作，以共同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活动，近年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韩流”和“汉风”在两国交相辉映，两国留学生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因此，随着中韩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中韩两国的国民外交和公共外交也必将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近两年来，中韩关系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其集中体现在“冷战”残余因素的影响、两国的历史文化纠葛和国民情感的下降，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中韩两国战略互信度的加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也使韩国部分国民产生中国威胁的疑虑心态。当然，中韩关系的不和谐因素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两国国民直接的理解、沟通不够，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存在误解。

因此，在“冷战”后中韩关系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两国应该采取措施大力加强两国国民情感的培养和国民公共外交，同时，进一步从中韩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入手，以发挥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累积战略互信的基础。如此，中韩关系的发展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国民基础。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进一步加强“冷战”后中韩两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加强国民情感交流和大规模的民间公共外交，必将为 21 世纪中韩两国的睦邻友好和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成为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目 录

第一章 韩国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1)
第一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实施的背景	(1)
一、地缘政治	(1)
二、韩国历届政府的北方政策	(2)
三、韩国政经形势的发展和统一战略的变化	(4)
四、世界及朝鲜半岛周边环境的变化	(6)
第二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的内涵及其实施	(8)
一、北方政策的内涵	(8)
二、北方政策的外交战略目标	(10)
第三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政策对中韩关系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13)
一、“北方外交”政策的实施	(13)
二、北方政策和中韩建交	(14)
三、北方政策和韩苏建交	(17)
四、“北方外交”与韩美关系	(20)
五、“北方外交”与朝美关系	(23)
六、“北方外交”与韩日关系	(24)
七、“北方外交”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26)
第四节 对卢泰愚政府实施的“北方外交”政策的评价	(29)
一、“北方外交”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	(29)
二、“北方外交”政策的局限性	(30)
三、“北方外交”政策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31)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33)
第二章 金泳三政府“世界化战略”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34)
第一节 “世界化战略”提出的背景	(34)

一、“冷战”后韩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分析·····	(34)
二、金泳三政府“世界化战略”的提出与定义·····	(36)
第二节 “世界化战略”和金泳三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38)
一、中韩关系在韩国“世界化战略”中的地位·····	(39)
二、金泳三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上的转变与特点·····	(42)
三、“世界化战略”对金泳三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	(48)
第三节 “世界化战略”实施下中韩关系的发展·····	(51)
一、“世界化战略”促进了中韩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	(51)
二、“世界化战略”推动了中韩双边经贸关系·····	(53)
三、“世界化战略”对中韩社会文化关系影响深远·····	(55)
第四节 “世界化战略”实施及其对发展中韩关系的制约因素·····	(57)
第三章 金大中政府时期的中韩关系·····	(60)
第一节 金大中政府时期中韩关系的发展·····	(60)
一、中韩政治关系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展开·····	(60)
二、中韩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67)
三、金大中政府文化战略与中韩文化关系的发展·····	(72)
第二节 金大中政府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原因·····	(77)
一、历史地缘因素·····	(77)
二、经济原因·····	(79)
三、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战略需要·····	(80)
第三节 金大中政府时期中韩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84)
一、中韩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84)
二、中韩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85)
三、中韩关系中的朝鲜因素·····	(87)
四、中韩关系中的经济制约因素·····	(88)
第四章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及其对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91)
第一节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提出的背景与内涵及其特点·····	(91)
一、“和平繁荣”政策提出的背景·····	(91)
二、“和平繁荣”政策的内涵及其特点·····	(92)
第二节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对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96)

一、“和平繁荣”政策对中韩政治关系的影响	(96)
二、“和平繁荣”政策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	(101)
第三节 朝鲜核试验背景下的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的趋向与韩美关系的调整	(103)
一、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动机与目的	(103)
二、朝鲜核试验后韩国继续推进“和平繁荣”政策	(105)
三、韩美关于朝鲜核试验的政策分歧	(107)
四、“和平繁荣”政策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112)
第五章 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与中韩战略伙伴关系	(114)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提出的背景	(114)
一、韩国国内政局的变动	(115)
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	(116)
三、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	(117)
第二节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119)
一、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120)
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	(122)
三、中韩两国关于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利益考量	(124)
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126)
第三节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与对朝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130)
一、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及其动因	(130)
二、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特点	(134)
三、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影响	(138)
第六章 “冷战”后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	(142)
第一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	(142)
一、全球化、区域化与非传统安全	(142)
二、西方区域一体化理论对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指导意义	(144)
三、“二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146)
第二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48)
一、必要性分析	(148)
二、可行性分析	(150)

第三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主要合作领域现状及成果	(154)
一、金融安全合作	(154)
二、能源合作	(156)
三、生态环境合作	(160)
四、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166)
第四节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趋向、制约以及对策	(169)
一、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趋向	(169)
二、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172)
三、建议及对策	(176)
第七章 “韩流”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	(179)
第一节 “韩流”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179)
一、何谓“韩流”	(179)
二、“韩流”在中国的传播概况与特征	(181)
第二节 “韩流”：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形式	(185)
一、“韩流”的兴起与韩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推行	(185)
二、“韩流”：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	(190)
第三节 “韩流”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效果分析	(193)
一、“韩流”与韩国对华经济目标的实现	(193)
二、“韩流”与韩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198)
三、“韩流”与中韩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00)
参考文献	(206)
后 记	(221)

第一章 韩国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第一节 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实施的背景

一、地缘政治

地理位置是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美国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之一、著名地缘政治理论家斯皮克曼曾提出著名的“边缘地带”理论。他指出，他所说的“世界权力中心”既不在海上世界也不在大陆世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陆地，他称之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梅尼格（1956）则把边缘地带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之为“外岛”（extrainsular）和“内岛”（intra-insular）。前者向外面临着海上世界，后者向内朝着大陆世界，真正的力量中心在边缘地带，这就是海上和陆地强国通过获取和维持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以增强其实力的缘由。^①显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在解释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朝鲜半岛地处大陆和海洋的衔接部位，它的北部同中国和俄罗斯接壤，东部同日本毗邻，西海岸距中国山东半岛的最短距离约 190 公里，南部距日本本州岛约 180 公里。它的一端与大陆接壤，一端伸入海中。所以，朝鲜半岛就像一道围堵日本海的长堤，又像一个踏入亚洲大陆的跳板，具有独特的显著的地缘战略特征，加之朝鲜半岛扼守东北亚海上交通要冲——朝鲜海峡，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其地缘政治价值。因此，周边国家都视其为必须争夺的关键地区，特别是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在此盘根错节。“两千多年来，朝鲜的命运不是为一国控制朝鲜这种优势地位所左右，便是由争夺这个

^①参见（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2 ~ 163 页。

控制权的两国均势来决定。”^① 韩国已故总统朴正熙也曾感慨地说过,“如果我们的历史是一部受难和外国入侵的历史,那么这是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的”^②。这不仅说明了朝鲜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说明了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冷战”以来,朝鲜半岛作为中、美、日、苏(俄)四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自然成为直接影响四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高崇云所讲:“朝鲜半岛就像一枝怯生生的触角,神经过敏地长在大国的身边,因此就变成大国间冲突或平衡的温度计。”^③ 朝鲜半岛作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经济发展的失衡点和安全机制的空白点”^④,使其成为东北亚乃至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亚洲的巴尔干半岛”^⑤、“东亚的巴勒斯坦”^⑥。

韩国处于朝鲜半岛这一东北亚区域中心独特的地理位置上,虽然它不与中国和俄罗斯直接接壤,但是作为半岛一个整体的部分和欧亚大陆的自然延伸体,它的地缘战略考虑基本上来自半岛这个特定位置。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韩国在国际政治中占有极其突出的战略地位。

1945年,朝鲜半岛就因美苏的争夺而陷入了南北分裂,朝鲜战争不但没有实现南北的统一,反而又使南北分裂固定了下来,朝鲜半岛因此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前沿阵地,韩国自然也就成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最前沿阵地。这样的现实使韩国不得不把自己完全置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样,韩国就同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所以,严格地讲,从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到卢泰愚政府上台以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北方外交,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只是韩国历届政府致力于防御朝鲜的对南武力“赤化”战略,以维护韩国的安全,可以讲是对朝鲜的一种“防御战略”。

二、韩国历届政府的北方政策

李承晚政府的北方政策可以概括为所谓的“北进统一论”。“若因共产主义分子的镇

①(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②(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陈琦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③高崇云:《中共与南朝鲜关系的研究》,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④季志业:《关于东北亚的区域合作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23~24页。

⑤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⑥Robert R. Simmons, *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 Pyongyang, 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 3.

压与抵抗不能收复北方，则大韩民国将动用武力恢复对朝鲜方的主权，为此加强国防力量。”^① 李承晚政府坚守不承认北方政权的原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代表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以“解放朝鲜”为目标的“北进统一论”成为当时韩国政府北方政策的核心。朝鲜半岛局势异常紧张。

张勉政府的北方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由李承晚时期的朝鲜单独选举论转变为朝韩同时选举论，并否定了李承晚政府的“北进统一论”。1960年8月24日，张勉内阁的外长郑一亨公开表示：“政府将尊重联合国决议，并赞同通过在整个韩国范围内实施联合国监视下的自由选举以实施韩国统一的原则。过去自由党所主张的利用武力来统一韩国的武断政策，应加以废除。”^②

朴正熙政府前期的北方政策和张勉政府并无二致，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北进统一论”，主张通过南北协商来实施朝韩总选举。其最大特征是将南北体制竞争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面，实际上有意回避了统一问题的争论。朴正熙在1967年的国会新年致词中曾指出，“当今阶段的统一之路，就是经济建设和培养民主力量”^③，实际上是主张唯有韩国的经济、自由与民主主义能够流入朝鲜之际，朝鲜半岛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尼克松政府调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导致了中、美、苏等大国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韩国和北方各国的关系也相应地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当时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主张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对峙的紧张局势，这促使韩国政府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北方政策。1970年8月15日，朴正熙在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25周年讲话中提出“南北双方进行友好竞赛，看看哪种政治制度在七十年代使朝鲜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方面取得胜利”^④。所以，朴正熙政府后期的北方政策可以概括为“培养实力、胜共统一”。

全斗焕政府曾提议朝鲜半岛南北最高领导实现互访，或者举行最高级会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初至1986年初，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的多次对话，时间长、渠道多、进展快、层次也较高，为后来南北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南北双方长期的敌视与互不信任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等方面的原因，韩国对朝鲜的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转变，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总的来说依然紧张。全斗焕政府时期韩国北方政策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民族和解、民主统一”。

①(韩)金正源：《韩国外交发展论》，集文堂1996年版，第87页。

②俞炳勇：《1948年以来韩国政府的北方政策研究》，《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3期。

③俞炳勇：《1948年以来韩国政府的北方政策研究》，《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3期。

④宋成有：《中韩关系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三、韩国政经形势的发展和统一战略的变化

朴正熙政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根据韩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成功发挥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指导作用,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出口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使韩国经济起飞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实施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的落后面貌,韩国经济从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迈进。据统计,1960—1970 年,韩国出口增长率年均达到 39.2% (同期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 9.3%),是世界上出口贸易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①从 1962 年到 1979 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由 23.2 亿美元增加到 636.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9.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8.9%。^②进入 80 年代,韩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韩国很快就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从而大大提高了韩国的综合国力。1988 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512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达到 3600 美元。^③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和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卢泰愚政府才能够自信地推行“北方外交”政策,并通过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来积极发展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因此,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韩国也要改善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当时,韩国为了获得资源而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大力开展“资源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对于韩国这样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东北地区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是资源宝库,毫无疑问,韩国同中国、苏联改善关系可以开辟新的资源市场。

韩国经济是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对外贸易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韩国的出口过分依赖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据统计,1966—1972 年,韩国对美出口比重年均占出口总额的 46%。^④对美日出口的过分依赖必然使韩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极其脆弱。作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在 70 年代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美国把自己国内出现的产品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居高不下导致的经济不景气等问题归咎于韩国、日本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攻势,这给韩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很大的打击。到 80 年代,美国不但要限制进口韩国商品,还要求韩国开放国内市场,这更使韩国的对外贸易雪上加霜。因此,韩国必须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以摆脱困境,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韩国尚未打开的巨大市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①参见高连福:《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4 页。

②参见李敬南:《卢泰愚传》,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③参见龚洪烈:《韩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④参见高连福:《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7 页。

就,这无疑促使韩国积极谋求同苏联和中国改善关系。此外,韩国如果能利用西伯利亚的铁路,那么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价格就能降低5%,从而能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韩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务实的政策以摆脱困境,从而促进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80年代末,韩国实现了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的转型。这一方面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所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20年经济成长的产物”,“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权威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①可以说,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不仅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其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一支潜在力量,而且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使民众形成了较强的参与和革新政治的意识,为民主化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民主化运动的持续高涨是促成政治转型的最直接原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到830多万人。面对韩国国家机器几近崩溃的局面,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即《6·29宣言》)。这一宣言不仅扭转了已陷入政治危机的韩国国内局势,更为重要的是开启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大门,实现了军人政权向民选政权的和平交接,开创了韩国宪政史上的先例。不久,这八点宣言被写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到80年代末,韩国最终通过权威主义妥协和朝野协商的方式实现了由权威主义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这是韩国人民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的结果。1987年12月16日韩国总统全民直选,卢泰愚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通过国民的直接参与来确保政权的正统性,这为卢泰愚政府推行“北方外交”政策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

从本质上讲,朝鲜半岛的统一是朝鲜南北双方的内部问题;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特殊性,半岛的统一同时又和周边大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毫无疑问,朝鲜半岛的统一不能有损周边大国的利益,不然就会遇到困难,这也是朝鲜半岛问题复杂性的表现之一。

“冷战”以来,特别是朝鲜战争后,韩国一直认为中国和苏联是阻碍朝鲜半岛统一的“敌对外部势力”,而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称为“友好外部势力”。随着国际格局和朝鲜半岛周边环境的巨大变化,韩国政府的战略观念也发生了转变。1973年6月23日,韩国政府以朴正熙总统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6·23宣言》,声明韩国将向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所有一切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相同。这表明韩国已经准备同一切不敌视并且能平等对待韩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说明韩国已经意识到其长期实行的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已不合

^①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1页。

时宜,必须加以转变。特别是“冷战”后期,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东北亚局势的变化,韩国政府认为韩国同苏联、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朝鲜同美国、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对于实现半岛的和平统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遇到了难得的机遇。如果能争取苏联、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缓和乃至最终的统一,苏联和中国就可能由原来的“敌对外部势力”转变为“有利外部势力”。所以,韩国政府认为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调整以往的外交政策,以改善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进而为朝鲜半岛的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从李承晚政府到全斗焕政府,虽然韩国政府在此期间曾表示希望改善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例如早在1971年8月,韩国金溶植外长表示:“只要苏联和大陆中国不对大韩民国采取敌对行动,大韩民国政府愿意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①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贸、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甚至在政治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接触,但是基于复杂的主客观因素,韩国对外战略中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因素微乎其微。所以,就实质上来讲,如果说在此期间韩国有北方政策的话,那么这个北方政策主要就是对朝鲜的政策。另一方面,韩国的北方政策也随着国际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趋于理性与现实。毕竟韩国的国力在逐渐增强,韩国逐渐意识到必须转变以往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开展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毫无疑问,这为卢泰愚政府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北方外交”奠定了基础。

四、世界及朝鲜半岛周边环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格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中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国家或区域集团的崛起,世界正在形成多个权力中心与集团,国际关系日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大国,特别是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使国际紧张局势大为缓和,这使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两大潮流,这种东西方关系逐渐缓和的国际形势给长期以来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韩国推行新的外交战略打开了局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上台不久他就抛出了所谓的外交政策“新思维”。以该理论为基础,戈氏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苏联开始采取积极的和平共处与缓和紧张局势、减少对地区冲突的介入、提高外交活动效率的对外政策”^②。这不仅直接导致了美苏关系的缓和,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美国里根政府也因为实施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而使财政、贸

①(韩)俞炳勇:《1948年以来韩国政府的北方政策研究》,《东北亚论坛》2000年3期,第14页。

②David Holloway,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1 (Winter 1988/89), pp. 66–81.

易赤字等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困难增加,也需要缓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使美苏缓和出现了可能性,“冷战”格局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戈氏在积极谋求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也对亚太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给予极大关注,逐渐调整了其朝鲜半岛政策。在1986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和1988年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讲话中,戈氏向亚太地区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特别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讲话中,戈氏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要与韩国改善经济关系的意向。这时候中苏关系也迅速解冻,由于中国提出的“中苏边境问题”、“苏军从阿富汗撤军”和“柬埔寨问题”等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逐步消除,中苏关系大为缓和。中美、中日自从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后双边关系得到了不断发展。日苏之间尽管存在“北方四岛”问题,但是双边关系也因美苏关系的缓和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显然,此时韩国周边大国的外交已经开始超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更多的是追求各自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利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中、日三国与苏联对峙的局面在这时已经开始消除,这也使东北亚国家之间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这为韩国推行新的外交战略以改变过去消极和被动的局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如著名的国际观察家陶炳蔚后来论述中韩关系的迅速发展时所说的一样:“随着‘冷战’的接近尾声,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并且最终摆脱了‘冷战’的阴影,表明两国之间的冰河已经完全融化。”^①

20世纪70年代末,为克服经济落后和社会僵化局面,中国开始通过改革来重建社会经济,同时根据新的国际局势调整了对外政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在国内也进行了改革,对外则实行“新思维”外交。1988年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提出“在朝鲜半岛局势普遍好转的背景下,可以为与朝鲜半岛南北建立经济联系开辟可能性”^②,表明苏联的朝鲜半岛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进入8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转变以及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各国更趋于追求自己的实际战略利益,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韩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积极的回应。例如,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人员来往和贸易入手,对韩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追求实利的外交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也开始调整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主要是改变了过去完全站在朝鲜一边的立场和政策,将在不引起朝鲜过激反应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政策,尽可能松动和改善同韩国的关系。早在1980年初,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就形象地用“关门但不锁上”来形容中国的对韩政策,表明中国的对韩政策已趋向理性与现实。在经济上,中国和韩国通过日本、中国香港等第三国或地区的间接贸易额此时急剧增加。同时,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同韩国在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加

^①Tao Bingwei, “The Korea Peninsula and Northeast Asia: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Vol. 16, No. 4 (Winter 1992), p. 687.

^②新华社莫斯科1988年9月16日电。